



勤工俭学生活回忆

何長工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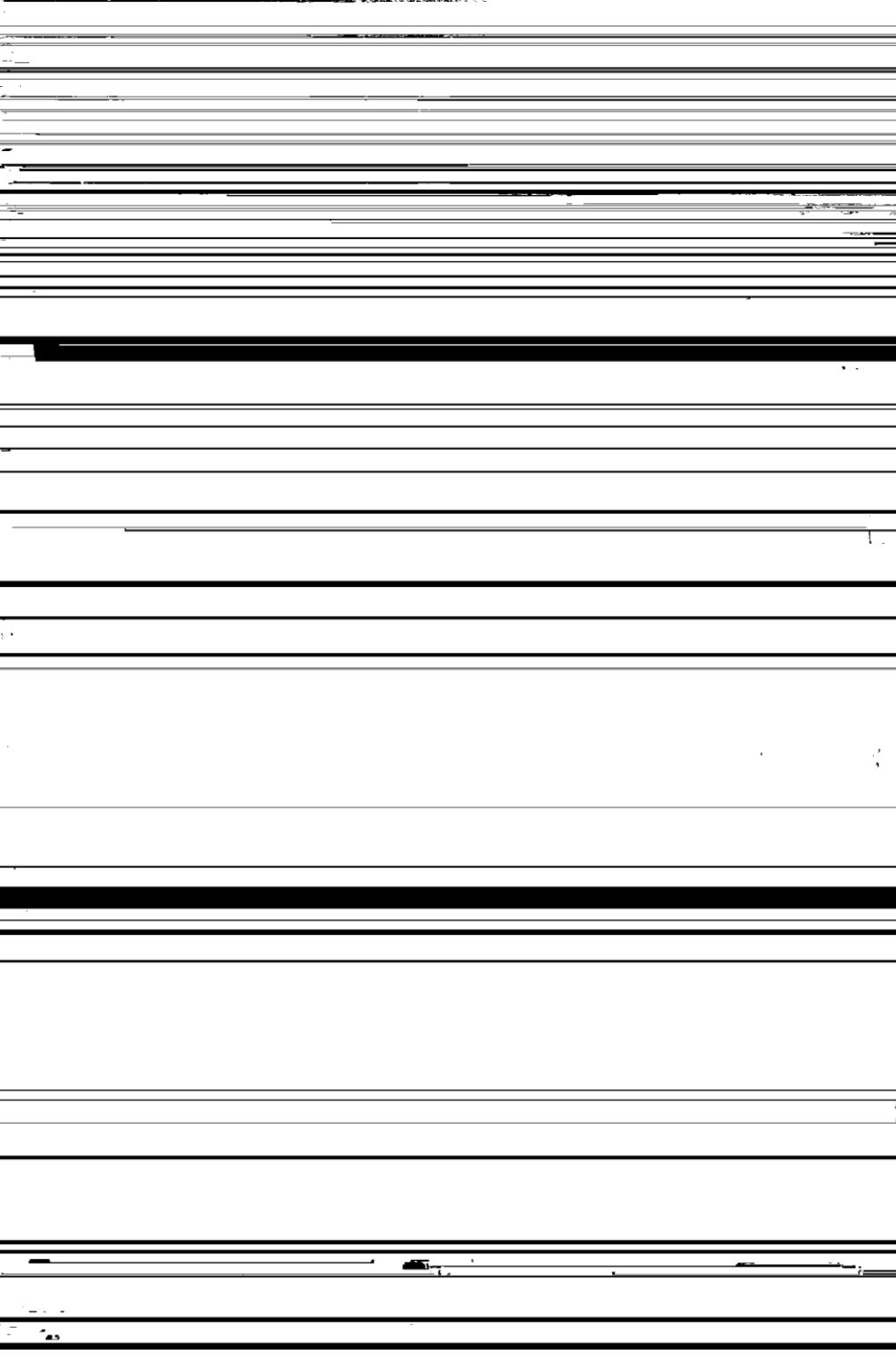
工人出版社

勤工俭学生活回忆

何長工著



工人出版社
1958年·北京



前記

工人出版社要求我将当初留法勤工儉學的生活与斗争情况写出来。留法勤工儉學生活轉瞬將届四十年，許多細节在記憶里已比較模糊，写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这究竟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情，特別是因为我們党的領袖毛澤东同志發起留法勤工儉學运动这段史实，還沒有較完整的文字記載；而这段生活对我自己工人阶级意識的初步形成，革命人生观的初步确定，及早地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都有着啓蒙和推动作用。对我以后投入長期的艰苦的革命斗争更有着深厚的影响。因此，我就不揣冒昧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勤工儉學是我国革命知識分子在求学上的优良傳統。早在差不多四十年前，中国还是一片烏云籠罩的时候，一些工人阶级革命先輩，为了抗击旧社会的压迫剥削，就繼承和發揚“五四”运动的傳統，在極端困难的条件下，寻求建国的知識和救国的本領。当时，他們还都比較年轻，首先在勤工儉學的生活中经历了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实践，开始培育了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培育了坚定不移的反帝国主义、反

封建勢力的革命意志与斗争决心。他們在以后長期艰苦曲折的革命道路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終如一地、百折不回地献身于革命事业。其中許多人，表現了高貴的革命品質，为革命牺牲了生命；現存的一部分人，則成为党和政府部門中較為負責的领导者。

在剥削阶级占統治地位的社会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脱节，知識分子与劳动人民相对立，在知識分子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地形成了輕視劳动、輕視群众的剥削阶级思想。这种反动的思想观点，在今天來說，还严重地影响着我国的青年。如何使他們選擇一条正确的道路，早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課題了。走紅專的道路？还是走白專的道路？这是一个斗争。要走紅專的道路，就必须勤工儉學，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一方面學習建設社会主义的本領，一方面在生产实践中改造思想。

在将近四十年前的反动統治年代里，勤工儉學只是当时貧苦的革命青年在求知方面向黑暗势力作斗争的一个手段。在今天，勤工儉學已經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方向，是實現教育与生产劳动結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結合，知識分子与工农結合，理論与实际結合的唯一途径。这是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实行勤工儉學的本質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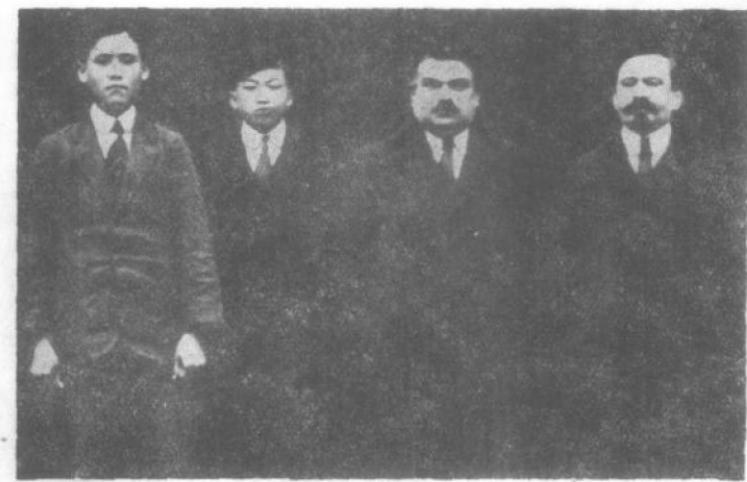
这本回忆录，提供了一些党的領袖在当时活动的情况，也提供了勤工儉学生在当时同封建軍閥官僚、帝国主义以及生活上的困难作斗争的一些情况。希望这些材料，对于讀者學習革命先輩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

能有所帮助。

写这部書的过程中，曾通过出版社的編輯同志，訪問过一些亲身经历过勤工儉學的同志，对有些史实作了初步的核对。如尚有失实或錯誤的地方，希望指正。

何長工

1958.9.



本書作者何長工同志(左第一人)在法國聖雪爾旺學校的照片。左第三、第四人系該校正副校長。(1921年攝)



徐特立同志
(右)四十年前在
法国的照片。



向警予同志(前排左起第四人)和蔡暢同志
(左第一人)在法国的照片。(1920年摄)

目 录

前記	1
好消息	1
勤工儉學的緣起	5
長辛店一年	12
旅費風波	18
旅途見聞	24
初到巴黎	32
聖雪爾旺	38
勤工生活	46
“二八”運動	55
風潮	63
中共旅歐總支部	72
到比利時	76

好 消 息

一九一七年冬天，我正在湖南長沙甲种工业学校念書。离畢業还有一个学期，我就發愁了。因为畢業就是失业，沒有一个年輕人不为自己的出路感到恐慌。尤其是我这样的家庭，出門讀書已不是易事，若是失业在家，那就更沒有办法了。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小学时的老师，又是世交的罗喜聞，从广东带回来一个消息。他說，他找到一个去法国勤工儉学的机会，可以借路費；还可以开法文班先学法文。怕我們不信，他还拿出几份留法勤工儉学的章程給我們看。

在我們这輩人中間，数罗喜聞腿長，跑的地方多，見的世面广。一些不滿現狀的青年，都乐意跟他跑。他这次去广东，原是為我們打听到南洋謀生的門路。門路沒有找到，却發現一个机器厂办事处的門口貼着这样一份章程，上面还写着負責人的名字。他进去打听，才知道負責人黃强就是工厂的厂長。工厂在城外，他跑到城外，找了两次，也沒找着，又写信去。隔两天黃强到飯店找他来了。

“章程上說可以借路費，是真的嗎？”他問黃强。“如果是真的，我們要来几个人。”

“章程上說的都可以想办法，”黃强說。“不过你們是湖南人，不懂广东話，在这里筹款不方便。不如到北京，那里

也可以想法借路費，伙食也比这里低。”

黃強給了他几份章程，并且寫信介紹他和北京大学校長蔡元培、教授李石曾接头。罗喜聞就拿着章程和介紹信回到湖南来了。

罗喜聞給蔡元培和李石曾写了封信。过几天，回信来了，叫和長沙教育会交涉，在長沙开一班法文班，教員由北京派；至于路費問題，他們說，以后可以想办法。不用說，大家都很高兴。罗喜聞馬上又跑到長沙，交涉开班，誰知这一次却碰了个硬釘子。不行。

我們当时的心情，真可以說是“慌不擇路”，就像溺在水里的人，見根稻草也抓一把，不管它頂不頂用。眼看这根稻草又要漂走了，所以个个焦急。我尤其覺得恐慌，因为我的家境比別人坏。

我的家乡靠近洞庭湖，从我上学那年起，几乎年年鬧水灾。人們听到“当当”的警报声，知道潰堤了，就丢下一切，逃到船上去，等到洪水退了，家也光了，日子也就越过越紧。我刚讀完小学，大哥就不願再养閑人，要我在家种田。亏得二嫂極力主張我升学，家里拿不出錢来，她和两个姐姐就自願多下田、多紡線、多养蚕，供我讀書。就这样，我才到湖南岳阳县上了第三联合中学。

这个学校是巴陵(即岳阳)、平江、临湘、华容四个县聯合举办的。校長苏暢仁，是个秀才，經常戴一頂黑緞子瓜皮帽，穿一身緞子長袍，外罩馬褂；走起路来，像迈台步一样。他对穷苦学生非常刻薄，这四个县本来还有不多一点补助

穷苦学生的伙食津贴，他给吞了。为这事，同学选我们九个人当代表去质问他。不料这老东西恼羞成怒，拍桌大骂，还要叫警察来捉人。

我们青年人血气方刚，忍不住动手揍了他两下。

事情闹大了，代表们在同学的掩护下，隐蔽了起来，警察到学校里，随便抓走十几个人。

事后，我们九个代表被开除了。

我回到家里，大哥拍桌摔椅，骂我不学好；母亲怨命不好；只有二嫂同情我，见我愁眉不展，还宽解几句。

就在这时，学校同学来信说，他们的罢课斗争胜利了：校 長答 应交出那笔伙食津贴；警察局放回了抓去的同学，并放鞭炮复学；开除的学生都开成成绩单、发修业证书转学。

于是，我到长沙考上了湖南甲种工业学校。这是一个中等技术学校，里面分纺织、化学、机械等科。我是机械科的插班生。失学在家是苦闷，临到毕业又是苦闷。先不说个人出路是个问题；就这样白手回家，连见我二嫂都觉得没有面目。日子过去一天，心事也随着加重一分。

寒假过去了。罗喜闻被我们几个年轻人逼不过，只得硬着头皮到北京去闯一闯。他这一去就没有信息，直到夏天，才得到他的信，叫我们去。这时，我正满十八岁，刚从甲种工业学校毕业。这一下，可得救了。

我和高风、毛羽顺等六七人，马上动身。

我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觉得什么都新鲜，对什么都好奇。一下火车，就有很多手拿掸灰棍的孩子，围着给我们

揮灰。我們不得不給他們幾個銅板。我們一邊走，一邊四處觀望。北京城多么古雅！街道上有很多旗人，特別是女的，她們穿着花花綠綠的長袍，上面綉着動物和花朵，髮髻挽的很高，吊着一串串的珠子，鞋兩頭蹠起來，底心很高，可是走起路來很平穩。碰見熟人，兩手一拱，往右边拜一拜，算是打招呼；男的有時還半跪一只腳。我們看着，都笑了起來。

街上還有一種怪現象：給外國人趕馬車的，穿的都是前清時官員的禮服。帽子上有紅寶石的頂子，後面拖着一根野鶲翎子，脖子上系着一長串朝珠，對襟大袍上面，前后挂一塊綉龍或綉鴿子等的方塊，這叫做“補”，聽說在前清的時候，什麼樣的官，該是什麼樣的花樣，都有規定。坐在車內的外國人，却穿着筆挺的西裝，神氣十足。

我們到了內府街。羅喜聞熱情地把我們安插下來。這里原來是五個人住三間小房子，現在加上我們六七個人擠在一起，真是熱鬧。大家都是準備留法勤工儉學的，在我們來以前，羅喜聞他們已經在北京大學學法文了。

勤工儉學的緣起

这里得說一說勤工儉學的緣起了。确切的史實現在并无文字記載可以查考，据亲身經歷的同志們說，早在清朝末年，一些关心时政的人物，深感国事日非，極需变法圖強。但要变法維新，就要学新学，学新的就得到外国去。当时政府也派了不少留学生，主要是去日本，学軍事，但选派的人多半是官僚貴族子弟。因此一些傾向新思想的青年就决心自筹路費，到国外去寻求知識。他們冲破重重阻碍，跑到日本；結果省吃儉用，一年不过用一百来元，而一个官費生，却要一千多元。这証明儉學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比官費还有意想不到的优点：学生不易养成浮华的習气。因此这第一批青年就广泛地發出了“劝留学書”，其中提倡最力的就是吳玉章同志。一两年間，自費留学在国内竟成了風氣，留日学生，由最初的几个人增加到三千多人。这可以算作勤工儉學的萌芽阶段；不过那时并不勤工，只是儉學。

到了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凱窃夺了国家政权，一些革命党人流亡海外。蔡元培、吳玉章等避居法国，从事反袁活动。当时在法国的还有李石曾，據說他是慈禧太后的干兒子。他父亲李鴻藻当过宰相，还教过光緒皇帝的書。他到法国最早，是以參贊大臣的名义去的。到巴黎以后，他就进学校

讀書去了。慈禧太后每年給他八千兩銀子，直到袁世凱當大總統的時候，這筆錢也還沒有取消。李石曾很有錢，他不在乎這八千兩銀子。蔡元培、吳稚暉寄居法國，都用過這筆錢。孫中山在法國進行革命活動的時候，也用過這筆錢。

李石曾很崇拜無政府主義。他和蔡元培、吳稚暉等人在法國辦了一個中國印刷局，出版了“世界”畫報和“世界六十名人傳記”等，宣傳科學和無政府主義。那時，國內無論什麼刊物都沒有照片，唯獨他們是膠版彩印，而且紙張也很講究，清晰美觀，所以風行一時。他們的一套印刷機、字模，是從日本買去的。印刷工人，是從中國招去的。

據說，李石曾對黃豆很有研究，曾在法國報紙上發表過文章，很受重視。後來，他從中國運了黃豆去，開了一個豆腐公司。工人都是從中國農村招去的。

印刷廠和豆腐公司共有一百多個工人。李石曾就辦了個“華工學校”，晚上上課。蔡元培、吳稚暉等，都在那裡教過書。講義也是他們自編自印的。以後有人把中國印刷局和豆腐公司的工人，稱為勤工儉學生。實際上他們不是真正學生。

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了，法國的男子差不多都打仗去了，工廠缺乏勞動力。法國政府想到中國人口多，便打算到中國來招工人。法國駐華公使向中國財政總長梁士詒接洽這事，梁士詒馬上答應，說要多少有多少，並在天津設立了一個招工處。

这时，李石曾向法国政府献計說：“你們找梁士詒这样的人不行，这些官僚不会做好事的，如果他送些流氓地痞来，不仅不会做工，还会把法国風俗搞坏。最好找可靠的人，替你們到中国西南各省，如云南、貴州、四川、广西等地，招收一些誠实的农村子弟到法国来，再組織一个华工教育机关。无论哪个工厂，只要上了五十个华工，就办一个教育班，教点法文和粗淺的中文，另外教点科学知識。这样对法国有好处，对华工也有好处。”

法国人同意了，請李石曾着手办。但西南各省的人都不願意到法国去，結果还是梁士詒做了这笔买卖。招工的条件是：願到法国去的，每人發一套服装，三百元光洋安家費。合同上規定，在一定的年限內，工資比法国普通工人低50%。梁士詒从法国人手里，捞了一笔手續費，又从每个工人的安家費中扣一百元，連騙帶拐，發了一笔横財。

这十几万华工，每人領了一套旧軍裝，到了国外。大部分按軍事編制，派了外国軍官，开赴战地，执行战争勤务。只有小部分华工，分到工厂做工。他們多是华北地区的，山东人很多。大个子，身强力壮，多数是手艺人。于是当时寄居法国的蔡元培、吳玉章、李石曾、吳稚暉等人就办了勤工儉学会，又和法国人士一起成立了华法教育会，由蔡元培当會長，李石曾当書記，进行各项教育工作。

在国内，总会設在北京。此后，在广东、上海等地設了分会。想用勤工儉学的办法，吸收一批貧苦有志的青年到法国留学。因此又設了留法勤工儉学会，在一些省份中进

行留法勤工儉學的宣傳。

北京總會辦公的地方在方家胡同。門口掛的也是“華法教育會”、“留法勤工儉學會”兩塊牌子。不過裏面只有一間辦公室，室內有一張辦公桌，一個電話機；經常無人辦公，只剩下一个看門的。

蔡元培在青年學生中威望很高。當羅喜聞找到他的時候，他說正想招一些有文化的青年去法國教華工識字。同意在北京為湖南學生開一班，並建議最好發動六十個能吃苦耐勞的學生來。羅喜聞就把這事給湖南報紙發了一條新聞。

我們到北京來的時候，湖南先後來了四五十人。其中有毛澤東、蔡和森、李維漢、李富春等同志。

毛澤東同志是從北大楊懷中教授那裡得到勤工儉學的消息的。得到消息後，他就組織了長沙新民學會的一批會員趕了來。很多人是湖南第一師範的學生，也有教師。後來成了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骨幹。這些青年不滿意腐敗無能的北洋政府，都想推翻它。渴望接受新思想，改造社會，恰好蘇聯十月革命成功，給大家指出一條路。這成了大家出國的動力。

那時，毛澤東同志住在楊懷中教授家里，晚上在客廳里搭鋪，白天拆走。他住的地方離我們很近。他和蔡和森同志几乎每天都到我們這裡來，商量勤工儉學的各種具體問題，研究那些官紳名流的話是否可靠。大家最關心的是出國的路費問題。羅喜聞在北京交涉了好久，找了好多湖